

浙江名人研究大系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主编 万斌

耶儒柱石

李之藻
杨廷筠

传

赵晖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耶儒柱石

李之藻
杨廷筠
传

赵晖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耶儒柱石;李之藻、杨廷筠传/赵晖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8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万斌主编)
ISBN 978-7-213-03523-4

I. 耶... II. 赵... III. ①李之藻-传记 ②杨廷筠-传记 IV. K8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5090 号

耶儒柱石——李之藻 杨廷筠传

赵 晖 著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176516
- 责任编辑 朱国栋
- 责任校对 戴文英 朱晓阳
- 封面设计 池长尧 殷 瞻
-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杭州桐庐瑶琳镇)
-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 印 张 10.625 插 页 2
- 字 数 24.3 万
-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213-03523-4
- 定 价 20.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赵晖，1970年出生于浙江海宁。2005年获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浙江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系。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西洋人东来之后——地理大发现后的中西关系史专题研究》（合著），发表的论文有《“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张学良和蒋介石》、《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缘起》等。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朴学大师 —— 孙诒让传

一代师表 —— 经亨颐传

国学巨匠 —— 张宗祥传

大鸿飞天 —— 常书鸿传

旷古书圣 —— 王羲之传

江东才俊 —— 罗 隐传

丹经之祖 —— 张伯端传

沉抑曲家 —— 张可久传

文臣之首 —— 宋 濂传

南村文儒 —— 陶宗仪传

耶儒柱石 —— 李之藻 杨廷筠传

拍案惊奇 —— 凌濛初传

曲中巨擘 —— 洪 昇传

子才子 —— 袁 枚传

史学大师 —— 章学诚传

浙江名人研究大系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主编 万斌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编撰指导委员会

顾 问:梁平波 盛昌黎 刘 枫 毛昭晰

主 任:陈敏尔

副主任:童芍素 沈立江 万 斌(常务)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万 斌	王凤贤	杨仁山	杨金荣	何一峰
谷迎春	沈立江	沈善洪	陈 铭	陈敏尔
钱巨炎	徐海荣	黄亚洲	童芍素	韩李敏
蓝蔚青	廖可斌	魏 桥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万 斌

副 主 编:卢敦基(常务) 陈 铭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万 斌	王志邦	卢敦基	任宜敏	吴 光
汪俊昌	陈 野	陈 铭	林华东	罗卫东
徐 晓	徐吉军	郭浴阳	程小澜	曾 骅
楼贤俊	滕 复			

总 序

万 斌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and 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

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顗、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

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赞、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 20 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丏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 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2003年春于杭州

引 言

16 世纪中叶,新建立不久的耶稣会把向海外传教作为其复兴天主教的重要手段。在耶稣会成立后不久就派遣沙勿略^①(Franciscus. Xaverius, 1506—1552)去印度传教,以后陆续有耶稣会士受命前往世界各地传播天主福音。

在东方,耶稣会士们先在印度传教,然后继续向东经东南亚北上来到日本。在日本获得传教成功后,耶稣会士们转向了东亚地区最大的国家中国,试图叩开这个文明古国的大门。

但打开中国的大门并不容易,即使是具备坚忍不拔精神意志的耶稣会士们也屡屡碰壁。最初尝试赴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沙勿略在上川岛郁郁而终,范礼安^②(Alexandre Valignani,

① 方济各·沙勿略,西班牙传教士,耶稣会创立者罗耀拉的挚友,在耶稣会创立后即加入,此后来东方传教,先后到达印度、斯里兰卡、日本等地。他在日本传教期间,了解到关于中国的一些情况,打算往中国传教,遂于 1551 年底乘船由日本丰后出发,准备随葡萄牙使臣出使中国,因出使计划受葡萄牙总督破坏,沙勿略被迫滞留于上川岛数月,盼望有中国船只可以冒险送其潜入中国,但其希望落空,于 1552 年 12 月初病逝于上川岛。

② 范礼安,意大利传教士,1566 年加入耶稣会。后任耶稣会东方视察员、印度省会长等职,在任职期间倡导耶稣会传教士学习东方语言,适应东方风俗,是利玛窦适应策略的坚定支持者。

1538—1606)也曾经发出“岩石啊,岩石,你何时打开”^①的感慨。直到万历十年(1582)12月,耶稣会士罗明坚^②(Michel Ruggieri, 1543—1607)、巴范济^③(Francois Pasio, 1551—1612)以商人身份进入广东肇庆,并获广东总督允可在当地居住,中国的大门才对耶稣会士们打开了一条缝。

在进入中国之后,为了顺利开展传教活动,使基督的福音为这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度所接受,耶稣会士们采用适应策略来消除中西文化间的隔阂。综观耶稣会的传教历史,其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修会在传教中适应传教地域风俗习惯的问题。“1542年,当保禄三世派遣耶稣会士博爱特(Broet)和萨摩荣(Salmeron)到爱尔兰去的时候,依纳爵(耶稣会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会长——引者注)命令他们要适应爱尔兰人的风俗习惯。当另一名耶稣会士巴雷托(Barreto)被阿比西尼亚提名为族长的时候,依纳爵给他下了指示,让他表现出广泛的适应精神。”^④早在远东传教活动开始之初,他们就十分重视对东方文化的适应问题。沙勿略在动身去中国传教前,曾专门致信耶稣会葡萄牙省会长劳特利盖,强调去中国的传教士必须是饱学之士,而且应使用当地语言传教。沙勿略在信中谈道:“来远东区传教的人士,为能在拯救人灵魂上,获得丰富的收获,应当具有下列两项

① [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李申校:《大中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② 罗明坚,意大利传教士,第一位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士。著有《圣教实录》,为耶稣会士撰写的最早的一部汉文天主教教义著作。

③ 巴范济,意大利传教士,曾随罗明坚入中国内地,居于肇庆,不久被逐至澳门,后赴日本传教。1612年被任命为耶稣会视察员,在赴中国内地视察途中病故于澳门。

④ [美]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专长:首先,他们应当是一批富有经验,不怕劳苦工作的标准会士;此外,他们还应当是一些学识渊博的人士。他们应当善于讲道,不是用欧洲话,而是用日本话和中国话。”^①

担任耶稣会东方教务视察员的范礼安在筹划中国传教事宜时明确指示传教士们必须尽量了解中国的礼俗、社会和民情,要委派学识和品德出众的传教士到中国人中居住,学习中国语言文字。^②

而利玛窦^③ (Mathieu Ricci, 1552—1610)在中国的传教过程中更采行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适应策略^④。他穿儒服,以儒家文化的语言来写作,并与中国的士大夫们频繁交往。在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神学不了解甚至有所抵触时,利玛窦首先以知识传教^⑤ 的方式扩大福音的受众。通过演示带来的各种科学仪器,撰写各类科学著作,介绍众多的科学知识,来吸引中国民众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对西学的兴趣,从而传播宗教的教义,增加皈依

① [西]沙勿略:《沙勿略致劳特利盖信》(1552年4月7日)。转引自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② 参见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第77页。

③ 利玛窦,意大利传教士,西学东渐时期最杰出的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由其采用完善的适应策略使天主教文化和中国传统取得了一定的融合,为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奠定了基础。他还通过知识传教的方法,将相当数量的西方古典科学知识传入了中国。

④ 关于适应策略的含义,依西比斯(J. Sebes)认为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适应: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翻译、伦理和礼仪。参见[意]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著,王志成、思竹、汪建达译:《晚明基督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⑤ 亦称学术传教。

者。这一方式取得了巨大成效^①，为天主教在中国赢得了众多信徒和立足点。借助于此种方式，大量西方知识亦随之传入中国，中西两大文化间首次较大规模的交流由此开启了。

随着相继来华的利玛窦、郭居静^②（L. Cattaneo, 1560—1640）、庞迪我^③（Didace de Pantoja, 1571—1618）、熊三拔^④（Sabbathin de Ursis, 1575—1620）、阳玛诺^⑤（Emmanuel Diaz Ju-

① 对利玛窦传教策略颇有非议的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 1559—1654）在给阿桂委瓦（Claudio Acquaviva, 1543—1615，耶稣会第5任会长）的信中也承认：“通达数学者，通达中国文字是吸引中国人信教的途径。”参见《龙华民神父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1610年11月23日），[意]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54页。莱布尼兹（Leibniz, 1646—1716）在1675年给法国大臣柯尔贝尔的信中也提到科技知识传播对于让异教徒接受基督教所起的重要作用：“您所推动的发明具有普遍和永恒的意义。一个波斯国王会惊叹望远镜的奇用，当一个中国的官吏认识到几何学家传教士的绝对可靠性时，他会是何等的惊喜。如果这些人看到您所建造的，这个完美的可以在任何时候观测到天空的真实情况的仪器时，他们会说什么呢？我想他们会承认人性中共存的神性，而这种神性尤其易于与天主教徒沟通。天空的秘密、地球的大小以及时间的量度等认识都是属于这一属性的。”参见《莱布尼兹致柯尔贝尔信》。转引自[法]詹嘉玲（Catherine JAMI）：《是“在中国的欧洲科学”还是“西学”？》，《法国汉学》第6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30页。

② 郭居静，意大利传教士，1581年加入耶稣会，1594年入华，辗转于韶州、南京等地，后赴上海、杭州传教，卒于杭州。

③ 庞迪我，西班牙传教士，1589年加入耶稣会，1599年入华，是利玛窦在华传教后期的主要助手，著有《七克》、《天主实义续篇》等著作，因南京教案被逐往澳门，不久卒于该地。

④ 熊三拔，意大利传教士，1597年加入耶稣会，1606年入华，著有《表度说》、《简平仪说》、《泰西水法》等著作，因南京教案被逐往澳门，后卒于该地。

⑤ 阳玛诺，葡萄牙传教士，1592年加入耶稣会，1610年入华，先后在广东、北京、浙江、江西、福建等地传教，并担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视察员等职，卒于杭州。

nior, 1574—1659)、龙华民^①等人的艰苦努力,耶稣会士们开始逐步在中国站稳脚跟。利玛窦的适应策略赢得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中不少成员的好感,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三大柱石相继皈依天主教信仰,叶向高、冯应京等虽未接受天主教信仰,但对于利玛窦的人格感佩之至,对于其传播的天主教信仰也颇为优容。正是在接受者和优容者的支持和帮助下,耶稣会士的传教行为得到了明政府的默许,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获得了稳定发展的空间。

利玛窦融合中西文化的传教路线吸引了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中的部分成员皈依天主教,这些中国基督徒为晚明时期耶稣会的在华传教事业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们在发生教案时挺身而出维护传教士,为他们提供藏身之所,平常则赞助教会进行的各种活动,为教会从事的各项事业慷慨解囊。他们热情地传播天主教教义,劝引他人加入天主教。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很难取得较大的进展和成功。

入华传教士们在知识传教的过程中,先后把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天主教理论体系传入了中国。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为代表的儒家基督徒在接受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方面走在明末士人的前列。他们与传教士合作,翻译、编译了大批西方数学、天文学、逻辑学、地理学书籍,为中国学者接受西方古典科学知识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还力图将中西科学加以会通和融合。

^① 龙华民,意大利传教士,1582年加入耶稣会,1597年入华,先后在广东、北京、浙江、山东等地传教,继利玛窦任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会长,派遣金尼阁赴欧洲,参与明末修历活动。在传教路线上与利玛窦有较大分歧。卒于北京。

正如徐光启所言：“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①在翻译和吸收大量西方古典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徐光启、李之藻等尝试以西算中的原理体系来补充、修正乃至改造中算体系。虽然他们在构建新的历算学体系方面未竟其功，但也极大推动了晚明时期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皈依天主教后，徐、李、杨等仍然保持着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的信仰。在遵奉天主的同时，他们也尽量将传入的西方天主教教义和传统儒家学说相结合，将传入的西学和中学相融合。

徐光启认为天主教“可以补儒易佛”^②，天主教理论与儒学的结合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③。李之藻认为：“东海西海，心同理同。”^④杨廷筠主张：“西学以万物本乎天，天惟一主，主惟一尊，此理至正至明，与吾经典一一吻合。”^⑤所以“夫‘钦崇天主’即吾儒昭事上帝也；‘爱人如己’即吾儒民我同胞也”^⑥。在三柱石看来，儒学与天主教教义并不冲突，天主教教义和儒学道统之间并无分歧，古儒所传儒学真诠与天主教教义无二。“儒者本天，故知天、事天、畏天、敬天，中华先圣治学也。诗书所称，炳如日星，可考镜已。自秦以来，天之尊始分，汉以

①（明）徐光启：《历书总目表》，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74页。

②（明）徐光启：《泰西水法序》，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册，第66页。

③（明）徐光启：《辨学章疏》，《徐光启集》下册，第432页。

④（明）李之藻：《〈天主实义〉重刻序》，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7页。

⑤（明）杨廷筠：《代疑续篇》，郑安德整理：《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20册，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0年编，第15—16页。

⑥（明）杨廷筠：《〈七克〉序》，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53页。